

曹操诗三题

涂光社

内容提要 本文重估了曹操诗的价值,指出其划时代意义之所在:其创作热情和成就远远超出汉代任何一位诗家,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拓展上都颇有贡献,首创的慷慨悲凉艺术风格影响了一代诗风。曹氏写景状物上有开创性建树,在诗史上有特殊地位。其游仙诗不宜完全否定;曹操诗中流露的忧生意识中有积极的成份和普遍意义。

关键词 划时代意义 写景状物 忧生意识

曹丕称乃父“雅好诗书文籍,虽在军旅,手不释卷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文帝纪》注引《典论·自叙》)。王沈《魏书》亦谓曹操“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,昼则讲武策,夜则思经传,登高必赋,及造新诗,被之管弦,皆成乐章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注引)。历代论家对曹操诗文的评议虽有出入,然而到了今天,人们的看法总的说相去不远。本文就几个尚可探究的问题略陈固陋。

一、曹操诗的划时代意义

评鹭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,主要看他比前人有何进步,对其时代和后来的文学有何影响。

鲁迅先生说,曹操是“改造文章的祖师”,其散文清峻通脱,确乎开一代风气。鲁迅所谓文章,未必包括诗歌在内,但并不妨碍我们作出其诗也极富开创性的判断。在两汉人们心目中,大抵赋是主要的文学体裁,文人对诗歌创作并不热衷。东汉后期,尽管五言诗趋于成熟,已显示出发展的广阔前景,却仍未取得如同当年《诗经》、楚辞那样主盟一代文坛的地位。据逯钦立《先秦汉魏南北朝诗》辑录,现存汉诗无主名的《古诗》(包括所谓“苏李诗”)六、七十首,是若干人的作品。此外,所录则以武帝、班固、张衡三家为多,也不过各存完整的诗七、八首而已。明胡应麟《诗薮·杂编》卷二概述西汉至五代文集,其中云:“自汉而下,文章之富,无出魏武者,集至三十卷,又《逸集》十卷、《新集》十卷。古今文集繁富,当首于此。陈思集

亦五十卷,魏文二十三卷,明帝十卷。吁!曹氏一门何盛也!今惟陈思十卷传。武、文二主集仅二、三卷,亡者不可胜计矣。”作为逐鹿中原三十余载的大军事政治集团的领袖,曹操集军机政务于一身,“鞍马间为文,往往横槊赋诗”(元稹《杜君墓系铭》语),所得居然如此繁富,实难能可贵。其文集今存不足十之一,诗仅20首(据《先秦汉魏南北朝诗》。其中《步出夏门行》的《观沧海》、《冬十月》、《河朔寒》、《龟虽寿》以及前面的序歌《艳》作为一首;少数篇章的残句不算在内。)尽管如此,亦可知曹操写诗的热情和成绩远远超过汉代任何一位诗家,这可以视为文学开始进入自觉时代的表微吧。

曹操诗在题材内容上有睥睨古今的独到之处。存诗大都以建安时代特定的社会生活为内容,涉及军国大事和政治理想的有11首。《薤露行》从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写起,概括了由于汉灵帝“所任诚不良”,外戚宦官相互倾轧导致国家基业倾覆的历史教训。谴责了董卓擅权弑君、毁弃东都的罪行。《蒿里行》追述初平元年以来军阀混战的原委和过程,以令人怵目惊心的笔触描述了战乱中人民大量死亡、社会极度荒凉残破的凄惨景象。昔日繁盛的中原地带,竟然成了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的赤地。从史籍中可以得知,这是当时社会遭受毁灭性破坏的真实纪录。面对国家人民的深重灾难,“念之断人肠”一句凝聚着激切痛楚的感情,以此收束全诗,表现出诗人对割据势力的痛恨和对人民的同情,暗示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历史使命感:要削平

战乱,济世拯民!如果说《蒿里行》“铠甲生虱虱”一句凸现了将士连年征战的困苦,那么《苦寒行》和《却东西门行》的全篇叙写更是军旅生活的实录。比如《苦寒行》极写建安十一军征高干率军北上太行的艰辛:道路的险阻盘曲,风雪交加、斧冰作糜的祁寒,野兽出没、人迹罕见的荒僻;抒写出征人抑郁悲凉的心境和思归之情。曹操深得为将用兵之道,能站在与士卒相同立场记叙行军的艰苦,倾吐切身体验和情思,披露出同全军将士苦乐休戚与共的作风和情怀。更重要的是,如此艰苦的连年征战是为拯救国家生民于水火,故诗人每每以周公自况。于是诗中的艰危困苦也就闪现出悲壮崇高的辉光。

《善哉行》其一与《短歌行》其二追叙西周和春秋时期开创王霸之业的明君贤臣的丰功伟绩,申诉了自己的抱负。《短歌行》其一则表现了为完成统一大业求贤若渴的主题。清人田雯说曹操诗“往往以汉末事叙入,别是一格”(见《古欢堂集》)。曹操是创业于乱世的一代雄主,且兼具不羁之文才,故能以非凡的胆略见识去勾勒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场景,这是一般文人难以企及的。《诗概》云:“曹公诗气雄力坚,足以笼罩一切,建安诸子,未有其匹也。”其实,纵观诗史,匍匐其下的又何止是建安诸子呢?

后世多以“慷慨悲凉”四字概括建安诗歌的风格特征。然而细审诸家所作,则可知唯有曹公诗堪称“慷慨悲凉”之典型。其后曹植的骨气奇高、词采华茂,曹丕的洋洋清绮,王粲的激切,刘桢的盛壮,蔡琰的悲怆,……尽管各有偏胜,却也体现出共同的时代特征。建安风骨形成的主要因素固然归诸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,但是曹操诗首倡其风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再从表现形式上看:以乐府旧题制作新篇并非自曹操始。《文选》李善注西汉班婕妤《怨歌行》云:“《歌录》曰:‘怨歌行,古辞。’然言古者有此曲,而班婕妤拟之。”长于曹操二十多岁的蔡邕亦有《饮马长城窟行》(青青河边草)。然而戛戛独造、大量写作乐府诗者,曹操确实是第一人。必须指出,曹操虽采用乐府旧题却不受其形式的拘束。如《薤露》、《蒿里》原是杂言,各四句而已,曹公所作则是各为十六句的五言诗;汉乐府的《步出夏门行》为五言,不分章,而此题的曹诗却是四章的四言诗;《陌上桑》的汉乐府名篇为五言,曹操所作则是三、七交错的杂言诗。愚以为用旧题或采用情调,未必依旧曲填词。《文心雕龙·乐府》云:“魏之三祖,气爽才丽,宰割辞调,音靡节

平。”大抵曹操被之管弦的诗作用的是新曲,否则何言“宰割”?与“音”与“节”也不会有异了。

曹操擅长比喻,对传统手法有所继承,也有所发展。如《却东西门行》先以鸿雁南北迁徙譬喻军旅行止无定,“行止自成行”以雁阵比况行伍,妥贴而形象。继而写转蓬随风飘泊,永远不能与故根重逢,道出长年征战思归不得的幽怨。其后又是神龙不出深渊,猛虎不离高冈以及狐死首丘的比喻,披露征人这终不可解的情结。此篇与汉代“古诗”风格近似,“田中有转蓬,随风远飘扬。长与故根绝,万岁不相当”四句,俨然《十九首》中语。在《短歌行》、《步出夏门行》等名篇中,成功的比喻的确熠熠生辉。比如《龟虽寿》起首的“神龟虽寿,犹有竟时;腾蛇乘雾,终为土灰”,虽是说生命必然有尽头,却显示出诗人高踞天外审视万古生灵的眼界和气度。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之喻本身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不朽形象。伏在槽上也许再也站不起来的瘦骨嶙峋的老马,仍然执着于纵横千里的抱负。它似乎比正值盛年在昂首奔驰的骏马更能唤起人们的同情、感慨和敬仰,这可以说是悲壮胜过豪壮的体现吧。如此成功的比喻,在曹操以前是很少见的。

综上所述,曹操的诗歌创作确乎具有划时代意义,标志着文学的自觉和一种新型的乐府诗人的出现,曹操可谓建安诗坛步入繁荣的先导者和推动者。

二、在写景状物上的开拓

《诗经》描状景物极古简,如《小雅·斯干》:“秩秩斯干,幽幽南山,如竹苞矣,如松茂矣。”但也有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(《采薇》)如此融情于物的名句。楚辞在这方面有长足进步,《九歌》、《九章》、《九辩》中均有不少细腻真切、感情色彩浓厚的景物描绘。汉代大赋往往对物象极尽铺陈,而诗歌却迥然不同,很少写景;汉乐府诗多为叙事之作,《古诗十九首》、《苏李诗》之类的文人创作则以抒情见长。然而曹操诗在写景状物上有重大拓展,体现出一种新的势头。

如果说《气出唱》其二的“华阴山,自以为大,高百丈,浮云为之盖”和《苦寒行》的“树木何萧瑟,北风声正悲。熊羆对我蹲,虎豹夹路啼。溪谷少人民,雪落何霏霏”的表述还略嫌粗犷的话,在《短歌行》中对月夜的描写已经相当精致了。《短歌行》中两次写到明月,一次剖白自己求贤的忧思沉绵长:“明明如月,何

时可辍。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”；另一次以乌鹊在月夜南翔寻求依托，比喻贤士的漂泊和徘徊游移。他们或者如王粲依刘表，诸葛亮躬耕南阳那样躲避战乱，或者在审时度势择主而事：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？”形象明朗清拔，不仅与全诗慷慨悲凉的格调吻合，而且使抒情言志免于单调，全篇为之增色。乌鹊并非候鸟，也不会在夜间作长途飞行。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”不过是想当然的情景。诗人只按抒写情志的需要去组合意象，读者也不会追究如此描写是否合科实际，因为它是艺术，它是诗。这种处理显示出文学的主体特征和诗歌艺术表现上的一种解放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进步。

《观沧海》是《步出夏门行》这组诗中相对独立的四章之一，是现存最早的全篇写景的诗。曹操北征乌桓凯旋途中，在碣石登高临远，描写了沧海山岛的壮美景象：

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。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
树林丛生，百草丰茂。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

此诗对自然景物作了比较客观的描绘，但人们也能从中体察出诗人的襟抱气度、审美取向乃至其对宇宙万物生命运动的理解。只是这样在描状景物中不见形迹的自然流露更耐玩味罢了。《观沧海》的描述顺序也合乎诗人感受和心灵的递进层次。登临眺望的第一印象自然是大海的浩瀚；竦峙的山岛与横无涯际的大海组成的纵横对比鲜明的画面格外醒目；驻足山岛，身边丰茂的草木摇曳零落加深了诗人对秋风萧瑟的感受；海上风起波涌的壮阔景象与其豪迈气概、博大胸怀共鸣，触发了日月星辰吞吐其中的幻想，使人读来恍若亲临其境，审美联想也随之递进。看来曹操擅长传达对景物的切身感受来加强诗歌的感染力，《苦寒行》“树木何萧瑟，北风声正悲”以下六句，读来满目荒寂、周身凄寒，也可与《观沧海》相印证。

与前人的写景状物相比较，曹操的简约与《诗经》相近，眼界胸襟则不可同日而语；其寓情于物或与楚辞类似却一派古朴浑成；有汉大赋的开廓恢宏而能出之于含蕴丰富的鲜明意象。华夏民族对大自然有一种亲合意识，认为宇宙万物与人的心灵和情感相通，是生机流荡的世界。因此，发掘并表现万物的生命运动、寄寓自己的感悟和情思从来就是中国古代艺术的一大主题，山水诗更是中国一绝。曹操诗

的景物描绘别开生面，色调苍凉意象浑成，非时人所能企及。其《步出夏门行·观沧海》若果为山水诗的发端之作，它在诗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。即使只将它看作这种题材的早期作品，也不能不承认它是极为成功的尝试。其后二三百年间，物色描写与山水诗曾盛极一时，并从此在诗坛据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。倘若说曹操在这方面作过开拓性的贡献，恐怕也是言之有据的。

三、关于游仙诗和忧生意识

曹操集中《气出唱》三首和《陌上桑》属游仙诗，《精列》、《秋胡行》二首也有这方面的内容。

早在先秦就有游仙内容的诗歌。清人黄子云《野鸿诗》说：“游仙诗本之《离骚》，盖灵均处秽乱之朝，蹈危疑之际，聊为乌有之词以寄兴焉。”《离骚》后半部分以诗人在幻想境界中的游历、交往、求索、对问来剖白心迹，展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内心的矛盾痛苦、称之“游仙”，略嫌勉强。《穆天子传》可能产生于战国时代，其中有周穆王与西王母在瑶池互为赠答的歌谣，很可能是游仙诗的滥觞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，三十六年“使博士为《仙真人诗》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名家有黄公疵，“为秦博士，作歌诗”，大概是《仙真人诗》的作者之一。此诗早佚。汉乐府中除郊庙祭祀的娱神歌辞外，属游仙诗的还有《八公操》（一名《淮南操》）《吟叹曲》的《王子乔》、《平调曲》的《长歌行》、《瑟调曲》的《步出夏门行》（一作《陇西行》）和《善哉行》等，这一类诗歌出现当然与秦皇汉武热衷神仙方术，光武帝迷信谶纬不无关系。“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”。

中国科学院文研所《中国文学史》指出：“（曹操）《气出唱》等游仙诗宣传神仙长生等思想；《秋胡行》除了游仙外，还有宿命思想”，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足取”。对此徐公诗先生则认为：“游仙内容，当然说不上有多少积极意义，但我们也不能遽然将它划入消极作品一类里去。曹操自述‘性不信天命之事’，史载他曾‘除奸邪鬼神之事’，曹植也曾说过，对方士神仙之说，‘家王及太子与余兄弟皆不信之，咸以为调笑’，所以不能以此指他在宣传神仙长生。我以为这些包含着游仙内容的作品，当时主要是为了用于宴饮侑酒场合而制作的，其性质不过是‘以为调笑’之资而已。”^{〔1〕}徐说更接近曹操的思想实际。

好生恶死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，健康长寿是

人们的普遍愿望。因此《幽风·七月》中终年辛劳备受屈辱的农夫仍“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”，有“称彼兕觥，万寿无疆”的相互祝福。当然，养尊处优的贵族统治者更希望长生不死，永享荣华富贵了。中国人或许更看重现世的幸福，追求存在和生命的乐趣。传统的孝道就有尊崇父母给予生命的内涵，所以《孝经》记孔子教导曾子说：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……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”滋生本土的道教，不涉来世和天堂地狱，只以修炼成真人，长生不老列入仙班为极至。东汉末年，文人的诗歌中经常流露出感慨人生短暂，勿宁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。仅《古诗十九首》就有“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斗酒相娱乐，聊厚不为薄”。《青青陵上柏》“浩浩阴阳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。万岁更相迭，圣贤莫能度”。《驱车上东门》“生年不满百，长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”。《生年不满百》更有甚者，声言放弃高尚追求和宏远志向去谋取现实的功利和荣名：“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风尘。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”。《今日良辰会》“人生非金石，岂能长寿考？奄奄随物化，荣名以为宝”。《回车驾言迈》这大概是一种似劝实讽的手法，以表明社会现实对道德理想的背离。由于政治腐败危机四伏，中下层文士普遍矢志伤时，与浓厚的忧生意识相伴随的自然是无奈和牢骚了。

曹操也深感人生短促，对生命极其依恋，但他与那些军国大事上不能有所作为的文士不同，毕竟是不可能造时势的英雄，在大业廓定而有待最后完成之际进入暮年，当然渴望获得恒久旺盛的生命活力。也许因为深知长生的愿望不可能实现，才在一些诗歌的幻想境界中去尽情宣泄。这大概是不信神仙之事的曹操写游仙诗的原委吧。

生命短暂与大业急切难成的矛盾是曹操诗的一个重要主题。《短歌行》开篇“人生几何，去日苦多”的忧伤不能简单地批评为“剥削阶级英雄人物思想性格脆弱的一面”（《中国文学史》190页）。它与篇末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的抱负并非毫无联系或者大异旨趣。抱负宏伟而功业未就使诗人生出年华易逝时不我待的感慨，时光紧迫更令他急切求贤忧思萦怀。恰

与屈原中的“汨余若将不及兮，恐年岁之吾与”相似。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情绪，产生于同一个基点，即切望在有生之年统一全国。全篇情调虽由抑而扬，大抵是因抒情言志层次上的需要而安排的，全诗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，其思想倾向绝不消极。《步出夏门行》流露的生命意识也极其沈厚。《龟虽寿》起始强调，即使长寿的神龟腾蛇也无法规避死亡的结局，其中不无生命短暂的伤感。然而笔锋一转，以伏枥老骥自喻，直言自己是不向天命屈服，矢志不移的壮怀激烈之士，年在桑榆仍奋发进取。而《观沧海》描摹的洪波涌动、秋风萧瑟以及大海对日月星辰的包孕吞吐，都传达出宇宙生命的律动，曹操在这里表现的是一种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物我如一的境界。

在造艺上“和”胜于“同”。无论情或境，对立统一构成的和谐总比单一层面的强调和重复更胜一筹。《短歌行》和《龟虽寿》抑扬回还，生之短促的悲凉与积极奋发的慷慨相反相成，仅此亦可知这两首诗在艺术上远非那些游仙诗可比，尽管它们在思想上不是没有相通之处的。

元康八年陆机见到曹操《遗令》而作《吊魏武帝文》，从其分香卖履的种种安排体察曹操临终时“雄心摧于弱情，壮图终于衰志”的心境，追想“执姬女鞶褱，指季豹而濯焉”的诀别情景，展示出一代枭雄内心世界脆弱优柔的一面。当然，吊文中灌注着陆机的感慨和共鸣，陆氏是知曹操者，也懂得人生和艺术。

有生必有死，人生总是不停步地走向衰老和生命的终结。这给人们带来伤感忧惧，是有自我意识以来人类难以解脱的情结。文学艺术中反映这种忧生意识无可厚非，更何况曹操有积极进取成就伟业的一面，他的诗蕴含着挚爱生命的积极意义。而且个体生命有限未必是坏事。正因为不能长生不死，才促使人们珍惜生命和时光，力求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所作为，使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。忧生意识的正面影响或许大于它的负面影响吧。

责任编辑 王英志

注：

①见《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》（第一卷）216—217页。